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钱德培 欧游随笔 李凤苞 使德日记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

FROM EAST TO WEST

走向世界丛书

主编 钟叔河 曾德明 杨云辉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走向世界丛书

主编 钟叔河 曾德明 杨云辉



钱德培欧游随笔 李凤苞使德日记

穆易 校点

岳麓书社·长沙

丛书新序 □

鍾叔河

二〇一三年十月

“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只收晚清时期 from east to west（从东方到西方）的记述，这并不等于说，只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才需要面对走向世界的问题。

纵观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决不是什么地区性和阶段性的活动，而是不断出现在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并与之同步的历史现象。一百万年前，人类开始从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一万年前，又从亚洲进入北美洲和大洋洲，就是在不断地走向世界。

从有史以来的文献、文物看，三千多年前的《奥德赛》和《出埃及记》，说的是古希腊人和以

色列人走向世界——走向地中海和巴勒斯坦。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和《汉书》，写了张骞和后来汉朝“益发使”走向世界——曾走到罗马在西亚的边陲。一千三百年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七百年前的《马可·波罗游记》和四百年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记下了阿罗本、马可·波罗、利玛窦的 from west to east，这和 from east to west 一样，都是在走向世界。

人类曾因地理、种族、制度、意识形态等原因而互相分离，甚至隔绝。夜郎国的君长初见汉使时问：“汉孰与我大？”当是时，夜郎的世界僻处黔西，其“大”可知；连夜郎都未入版图，则汉之“大”亦远不如今之中国。但人为万物之灵，为了求生存谋发展，总不能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总会要想方设法走向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于是，汉要“通西南夷”，要前往原来“道险终不能有”的夜郎；夜郎要问“汉孰与我大”，要想改变原来“不知汉广大”的状况。由互相隔绝变而互相接近，互求了解，这就是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无论是自己走出去还是让别人走进来（总比让别人杀进来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

被动的，从总的历史进程看，用大的历史眼光看，都有利于发展，都是一种进步。对汉朝来说是如此，对夜郎来说亦是如此。两千年前是如此，两千年后亦是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时是如此，如今来继续编辑出版这部丛书时亦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七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仍称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却早已“超英”，正在“赶美”，但走向世界的路还“漫漫其修远”。时至现代，走向世界当然是要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也就是要高度现代化，全盘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已经“化”出了很大的成绩，而我们的管理现代化，我们的服务现代化，我们的制度现代化……要走的的确还很长。

现代人走向世界，首先要使自己成为能接受全球文明，有世界知识，有世界眼光，有世界理想的人。“走向世界丛书”杰出的作者，如郭嵩焘、黄遵宪……又如邹代钧、金绍城……他们看到的新技术还是德律风（送话器和最早的手摇电话机）、火轮车（蒸汽机车）……我们如今却已经用上了智能手机、坐上了波音飞机……但在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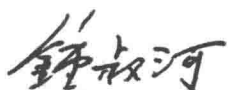
想层面上，我（不敢称我们）反省自己的世界眼光和世界理想，甚至在世界知识的某些方面，比起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郭、黄他们来，差距实在还不小。在这方面，也就是人的现代化这方面，要走的路就更“漫漫其修远”了。

五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世公认，它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大标志。它的口号：

ONE WORLD, ONE DREAM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也应该是现代人走向世界的志向和目的，是我们继续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志向和目的。

丛书原序 □



一九八〇年七月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乃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喷气式客机的时代，地球之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像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

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信的资料，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像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它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阴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同外界隔绝的古老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人们称林则徐和魏源为清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首当其冲，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将异国隔离开了。

过去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守旧派的办法是把脑袋钻进沙子里学鸵鸟，像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遮面。就是这个徐桐，在庚子年间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他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而林则徐和魏源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得不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一九一一年前国人亲历

欧美和日本的记述。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应该说康有为和在他之前的郭嵩焘、王韬、容闳等人，的确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当然，丛书所收的，也并不全属先进的人物的作品；但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中国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实录，自有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国家利己主义的本质，却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不免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为各书撰写的叙论中，适当地作些分析，供读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就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

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树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逐渐以现代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这就必需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和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丛书凡例□

(一) “走向世界丛书”一九八六年前已刊三十五种，二〇一五年起仍按原定一百种的计划继续刊行，仍然专收现代以前用文言写作的国人考察西方（含开国后的日本）的记述，仍以亲身经历、直接闻见者为限。

(二) 丛书按作者出国年月排列次序，尽量单行，即以—种为—册；只有字数过少无法单行者，才以两种或数种合订成册。合订本尽可能以类相从，按第—种出国年月排序；其各种均在封面列出书名，书脊则只列出第—种书名，并在其下注明“等几种”（另有附录者则注明“附几种”）。

(三) 每种(册)书前,均由编校者撰写导言(叙论),介绍作者有关背景和书中重要内容,酌加评论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四) 丛书均经编校者校订,标点分段,并加边批。边批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兹以《随使德国记》为例,举示如下:

1. 标题、提要和说明,如“星使由苏州来”、“普鲁士分一十二省”、“演八十日环游地球的故事”、“如夫人即赛金花”、“‘人工’今皆称工人”。

2. 书中较重要的译名(加括弧注出原文或今译),如“德瑾琳(Detring)”、“毕驷马(俾斯麦)”、“布莱门(不来梅)”、“德利风(电话)”。

3. 原文的订正和存疑,如“‘公司船’原无船字”、“‘骁勇’原作‘骑勇’”、“‘薛福成’成字原作辰”、“奥京立斯本应是维也纳”。

(五) 每种书后,均附人名索引,人名依首字笔画和一丨丿、乚排列,按年、月、日三节数字查检(正文单页码下均有年、月、日三节数字备

查)。如德瑾琳之“德”字为十五画，于索引“十五画”内检得其名下首列“13, 8, 17”，查正文“13, 8, 17”在P.3下，即可在P.3上找到（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七日“乘肩輿往拜税务司德瑾琳”的记载。

（六）每种书后，一般附有译名简释（今昔译名对照，必要时并加说明），亦依首字笔画和一丨丿、乚排列。如“卜兰墩浦 Brandenburg，勃兰登堡”，又如“勺勾腊 chocolate，巧克力”。

（七）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的条目，并不限于边批中所举者；边批中所举者，则必皆收入索引和简释。

（八）人名索引按年、月、日三节数字查检，其原书不著年、月、日者，则按篇章序号或页码查检。

（九）原文因排印（抄写）而出现的明显的文字错误径予改正，不在边批中出注。

(十) 原文中同一外国地名而作者译法多样，如缪祐孙《俄游汇编》中“彼得堡”就有“比得堡”“彼德堡”等异文，“莫斯科”也是如此。此种情形，无碍阅读，故一仍其旧，不作统一。

(十一) 原文中之统计数字均一仍其旧。少量表格中之统计数字，为方便读者阅读，改为阿拉伯数字。个别已经失去时效、并无参考价值的资料，则在说明情况后予以删去。

(十二) 丛书均以简体汉字印行；除总序、凡例外，编校者所作导言（叙论）、边批、索引中涉及的数字均按现行规定采用阿拉伯数字。

叙论：值得珍视的两份游欧记录□

穆易

光绪二年（1876），李凤苞以留学监督的身份带领数十名学生前往欧洲学习，光绪三年（1877）钱德培前往德国就任刘锡鸿使署随员。光绪四年（1878）李凤苞被朝廷任命为署理出使德国大臣，接替离任的驻德使臣刘锡鸿，钱德培被李凤苞留任，并替代博郎的使馆支应事宜。他们两个都留下了记录自己足迹的文字，就是钱德培的《欧游随笔》和李凤苞的《使德日记》，前者记录的时间跨度大，从光绪三年到光绪十年，而后者记录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无论时间长短，他们的文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值得我们珍视。

钱德培的欧洲游历见闻录

钱德培（1843—1904），字琴斋，号闰生，山阴（今

浙江绍兴)人。

光绪三年(1877)钱德培考取为出洋人员,于十月十八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新加坡、埃及,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意大利那不勒海口,十二月初四日抵达德国,次日拜见出使德国公使刘锡鸿(字云荪),并见到了同在使馆的参赞黎庶昌(字莼斋),随员刘孚翊(字鹤伯)、张斯恂(字听帆)、张凤书(字玉堂),翻译官庆常(字霭堂)、康音泰(字韶甫)、荫昌(字五楼)、翻译博郎等人。在欧洲生活了长达七年之后,因为身体原因,他申请离开欧洲,于光绪十年十月初九日回到上海。此后,他还出任过驻意、日、奥等国的外交参赞。因为长年在国外生活,对洋务非常熟悉,又颇有见地,因此深得当时朝廷大员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赏识。他陆续襄办北洋武备学堂,创办江南陆师学堂、江西武备学堂,并担任江南陆师学堂第一任总办。因为他在德国多年,对德国的军事非常熟悉,因此,他主张引用德国教育模式,聘用德国教习,使用德国教材,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

钱德培在欧洲期间,经历了刘锡鸿、李凤苞两任公使,在刘锡鸿任上,受刘委派,担任使馆支应各项账目入册造报的翻译事宜,在李凤苞署理暨接任驻德公使任上,除继续办理文案外,还接管了原由博郎经理的使馆支应事宜,并受李凤苞的委托,处理荷兰赛珍会中国馆的各项事务长达近八个月。在欧洲期间,钱德培还陪同专程前来欧洲的徐建寅(字仲虎)参观德国的制枪厂、火药厂、弹